



新常态的经济解释与趋势前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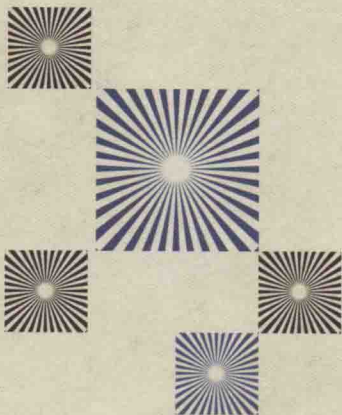
无论是全球经济增长还是中国经济增长，
21世纪第一个十年可视为确定性年代，
而第二个十年则进入不确定性年代。

对中国经济增长而言，
下一步的核心问题是：能否顺利转换增长轨道，
实现增长秩序的重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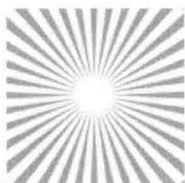
重构增长秩序

不确定性年代 与内生平衡增长

张文魁 著



中信出版集团 · CHINACITICPRESS



重构增长秩序

不确定性年代
与内生平衡增长

张文魁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重构增长秩序：不确定性年代与内生平衡增长 / 张文魁著.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3

ISBN 978-7-5086-5931-2

I. ①重… II. ①张… III. ①中国经济 - 经济增长 - 经济秩序 - 研究 IV. ①F12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35922 号

重构增长秩序

著 者：张文魁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6.25

字 数：144 千字

版 次：2016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ISBN 978-7-5086-5931-2/F·3601

定 价：5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010-84849555 服务传真：010-84849000

投稿邮箱：author@citicpub.com

经济增长大致属于宏观经济学的范畴，而笔者长期对宏观经济学兴趣阙如，甚至有点看不上宏观经济学，却对微观经济学偏爱有加。在长期的研究中，笔者深深感到，至今为止的宏观经济学，最大的问题并不在于函数化和数学化，而在于函数化和数学化的总量分析把经济运动的内在联系、内在规律和内在本质都抽离掉了，所以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甚至连森林也看不清楚，只看见平林漠漠烟如织，根本不知晓树木是怎么生长的。这里当然是说新古典范式，因为宏观经济学囿于新古典范式比微观经济学要更加严重，但又没有找到很好的路径可以突破这一框架。在标准的宏观经济学看来，经济增长就是要扩大总需求和总供给并形成均衡，而总需求不过就是以美元、日元、欧元、人民币等单位计量的货币流通量，总供给不过就是以这些货币单位计量的产值。而在微观经济学看来，需求不是什么

总量而是具体的，表现为不同人群的收入水平、财富水平以及他们对某些具体产品和服务的购买欲望、购买偏好。譬如张三即使有 100 万元可自由支配，也不能轻易等同于张三有 100 万元的需求，如果他想购买一匹马而不是一辆宝马车，哪怕使用税收优惠或贷款宽松等典型的宏观经济学工具，此时他的需求也很有可能还是 0。供给更是具体的，并不是 50 万亿元、100 万亿元总产值那么简约，而是表现为分布于几百家企业的 10 亿吨钢材和分布于几十家企业的 1 000 万辆汽车等。不同企业还有不同的品牌、品种、型号，那些企业要有较大把握将某些品种和型号的钢材、汽车卖出去，才会愿意增加产量，并且要能够以合意价格和合适渠道获得相应的土地、设备、人员、原材料、工艺方法、管理手段，才会实现增产。各企业之间还会相互竞争，以至于使企业面临不确定性和利益格局的重塑。这些活动都远远超出了宏观经济学的标准分析框架，也无法轻易地用货币等总量工具来调节。在经济学界内部，对经济增长理论的批评也已经不绝于耳，最切中要害的批评，是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鲍莫尔等人所指出的，经济增长模型有一个“失去的环节”，即没能将企业和企业家的作用纳入分析之中，不找回这个“失去的环节”，就无法完整地理解和分析经济增长。现实世界正是如此：没有强壮的企业群体，就没有强劲的经济增长。

不过，经济增长是如此重要，所以笔者还是涉足了这一研究领域。亚当·斯密的本意是关注经济增长，这个大家都知道。其实中国先秦时期的管仲对经济增长也有着深刻的理解，“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就是他的一个著名论断，看来中国并不缺乏追求经济增长和财富丰裕的传统。笔者对经济增长的兴趣，主要集

中于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机制，这不但是因为中国本身属于全球体系中一个最大的新兴经济体，还因为笔者以前曾对日本、韩国的经济起飞做过一些研究，以及目前对于南亚和东南亚可能出现的新一轮经济起飞比较关注，最重要的是，生活于中国是对新兴经济体保持跟踪研究的最大优势。笔者长期以来对制度经济学和企业发展做过一些研究，这对于理解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有所助益，并希望这一点研究经历能够帮助克服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思维局限，能够有助于寻找那个“失去的环节”。当然，新增长理论在过去二三十年的进展，虽然没能找回“失去的环节”，但无疑能够加深我们对于经济增长的认识、能够加强我们对于经济增长的衡量，尽管新增长理论更多的是探索成熟经济体的可持续增长。本书并不是一部理论专著，而是过去几年我在大众媒体上发表的一些有关经济增长的评论性文章的合集。如果这部合集能够让读者感到似有某些新颖之处，那就没有白费出版功夫了。

二

中国经济增长，无论是其重要性还是其复杂性，都无须赘言。中国经济在过去 30 多年里的高速增长被视为是全球范围内的一个奇迹，而在“十二五”后期的经济增速明显滑落也自然引起全球性讨论。不过，无论是从全球经济增长历史来看，还是从经济增长机制来看，中国奇迹不算奇异，也不算奇妙。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约 30 年的高速增长，其基础是巨大的追赶空间和后发优势。有了这个基础，所要做的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只要能

够充分实现资源动员和要素投入，沿着先发国家开辟的工业化和企业化道路走下去就可以了。

总体而言，这一高增长主要来源于外生的效率提升空间和大量的要素投入以及拷贝性的企业制度。这是一种典型的外延追赶式增长轨道，不独中国，“二战”之后不少国家都在这一轨道上运行过，从而踏上了阶段性高增长的进程。要说有不一样的地方，那就是中国在 1978 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市场机制的引入刺激了这一进程，与全球经济的对接加快并延长了这一进程。当然与东亚其他一些经济体比较一致的是，权威主义的政治体系保护了这一进程。尤其是，中国在 2003 年以来的这一轮超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三大红利：重化工业红利、“入世”红利、改革红利。重化工业的加速发展，是因为进入 21 世纪之后，我国人均 GDP（国内生产总值）超过 1 000 美元，导致消费升级快速推进、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快速推进；我国在世纪之交加入 WTO（世界贸易组织），使中国经济更好地融入全球体系，中国制造产品的出口迅猛增长；20 世纪最后几年到 21 世纪最初几年大力度的改革，特别是国有部门大刀阔斧的改革，使新陈代谢的增长机制得到一定程度修复。

高增长无疑带来了极为正面的结果：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国家综合实力显著增强，生产力水平和基础设施水平都非昔日可比。不过，外延追赶式增长是一种非常依赖要素投入和规模扩张的增长方式，这导致了对投入的过度依赖，同时会产生重大的失衡，包括产业结构失衡、储蓄与消费等重大比例失调、收入分配和国民福利的不平等，等等。需要指出的是，这个阶段的许多失衡其实是一种有意的策略性失衡。例如在新中国成立之

初，毛泽东主席和梁漱溟有过一场激烈的争论。梁漱溟反对通过征收粮食、实行价格剪刀差等方式从农业“抽血”，主张给农民以更多实惠；而毛泽东则认为梁的主张不过是孔孟“施仁政”那一套东西。毛梁之争实质上是工农关系之争和消费积累关系之争，毛泽东是希望通过这种有意的失衡来加速实行工业化。

长期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这些重大失衡可以总结为这样一种逻辑：国内住户部门补贴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国内企业部门补贴国外住户部门和政府部门。在很长时期内，失衡可以通过后续增长本身来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或者通过外部经济体的对冲能力而获得缓解。因此，外延追赶增长也可以称为外延失衡增长。有趣的事情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全球冷战的结束和国际地缘政治的转折性变化几乎是同时展开的，因此在很长一段时期里，美欧发达经济体在客观上对冲了中国的重大结构失衡，与中国唱起了双簧，使中国可以不断提高储蓄率和大力发展制造业。

对 1978 年以来中国经济 30 年高速增长有了上述认识，就不难理解“十二五”后期的经济增速明显滑落。因为人口红利的消失、储蓄率的极限、追赶和模仿空间的收缩、外部世界对中国经济失衡的对冲瓶颈，都会导致外延追赶轨道上的运行失速。中国在 2010 年之后大致处于这样一个转折性时段。更何况，2003 年之后这一轮超高速增长所享用的两大红利也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

曾有许多追赶型经济体经历过类似的既有轨道失速，亚洲的一些追赶型经济体尤为典型。哈佛大学教授劳伦斯·萨默斯和他的同事在 2014 年完成了一篇论文，分析了经济增长的“亚洲亢奋”（Asiaphoria）现象，并

指出这种亢奋终将消退，实际上也可以理解为新兴经济体的既有轨道失速。从各方面指标和综合性现象来看，中国经济在“十二五”后期和“十三五”前期应该是处于既有轨道失速的敏感区域。如果新兴经济体不能成功地从外延失衡增长的旧轨道转向更加可持续的新增长轨道，那么亢奋症消退之后就有可能被冷漠症所困扰。

当下，中国应该努力转向新增长轨道，避免亢奋症之后的冷漠症。在这个新轨道上，经济增长主要不是依赖大量的要素投入和追赶式工业规模扩张，而是更多地通过在物质资本形成过程中内生地创造知识资本、使用知识资本、利用知识资本来摆脱物质资本报酬递减趋势，以更多的内生效率提升来实现适度的持续增长，同时极大地消除各种失衡，并促进社会全面繁荣进步。消除各种失衡、全面促进社会繁荣进步，不仅仅是要纠正国内住户部门对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的补贴、国内企业部门对国外住户部门和政府部门的补贴，更需要纠正那些被扭曲的收入分配和机会分配，使广大民众不但能够充分享受增长成果也能够持续投身增长进程。这是一条内生平衡增长的新轨道。

从构成经济增长各项重要因素的数量和效率水平来看，如果中国经济能够在 21 世纪第一个 10 年之后仍保持一定的速度惯性，并能够成功地转向内生平衡增长新轨道，那么在若干年份实现次高速或中高速增长，然后转向中速增长，是有可能的。

中国经济转向内生平衡增长新轨道，无疑面临着前所未遇的挑战。内生平衡增长意味着重大结构的再平衡，应该明白，再平衡是一条崎岖之路。从产业结构来看，由于中国已经处于工业化中后期，至少中国工业化的鼎

盛时期已经过去，下一步的经济增长将不得不降低对工业化的依赖程度。“十二五”中后期，我国的服务业发展正在加速，这是一个好迹象，但我们不应该忽视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服务业生产率的低增长。

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鲍莫尔在对非平衡增长的宏观经济学研究中，论述了从制造业主导到服务业主导的经济增长进程中，服务业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成本膨胀和生产率增速滞缓的问题。也就是说，服务业是一个生产率进步缓慢的行业，这会导致整个经济增长步入迟缓状态，甚至出现滞胀的风险。他还提醒，密集的研发活动并不一定带来经济的高速增长，因为研发本身也是一个服务行业。他的研究已经被许多国家的事实所验证。

不能忽视的是，服务业仍然不是一个全球化的行业，难以像制造业那样接受充分的国际竞争和融入全球创新体系中去，这一点也会导致服务业主导的经济缺乏足够的活力和创新。因此，尽管中国的服务业在“十二五”期间持续加速、研发活动日益活跃是我们乐于见到的，对我国下一步经济增长将会做出重要贡献，但如果把从制造业主导到服务业主导简单地理解为以服务业来取代制造业，或者在服务业膨胀的同时可以让制造业萎缩，那就大谬不然了。因此，在我国经济结构的再平衡进程中，应该考虑如何为我国制造业注入新的活力。特别是，如何使服务业发展更多地推动制造业生产率的提升和全球竞争力的增强，是一个必须得到高度重视的议题。

重大结构的再平衡还涉及消费和投资、内需和外需等关系的再平衡。现在，这几组关系正在朝着我们期望的方向改善。消费和投资之间的再平

衡实际上存在很大争议，这在许多国家都是如此，所以毫不奇怪。而且，再平衡并不是刻意压制投资，而是要改变那种过度扭曲的状态。当然，消费具有内生性，与收入分配高度相关，这归根结底还是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样，外需与内需之间的再平衡，也不是简单地放弃外需，而是不得不放弃对外需的过度依赖，同时也要高度关注中国工业制成品的全球竞争力是否下滑。

转向内生平衡增长新轨道，更意味着增长动力的再构建。增长动力的再构建将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过程，只有亲历方能知晓。探讨国民经济在一个较长时间进程中的增长动力，现有的分析框架采取的是供给侧视角，这个视角大致较有道理。当然，供给侧的投入增加和效率提升需要转化为需求侧相应的收入和支出，这是一件更复杂的事情。从供给侧视角来看，过去 30 多年的增长，到底可以多大程度上精确分解成要素投入和生产率提升的各自贡献，在经济学界有很多争议。不过争议较少的是，过去的生产率提升主要是来自技术和管理等方面与前沿经济体的差距，差距导致的直接引进、效仿、学习和改良等，使我们可以便利地进行生产率的追赶。的确，这种差距仍然存在且还比较明显。但是，当缄默知识在追赶中变得更加重要、当技术的环境敏感性在追赶中成为更大障碍的时候，我们的经济增长动力，需要从以前过于依赖不断加码的要素投入、过于依赖物质资本的积累利用、过于依赖外延工业化而容易实现的生产率追赶，转向更多地依赖人力资本、知识资本的积累利用所贡献的生产率，从而内生地克服要素投入的约束和物质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的障碍，使我国的经济增长得以维持在一个符合逻辑的水平。这种内生增长动力的构建，一方面被再平衡的压力

所逼迫，另一方面也会助益再平衡。因此，增长动力再构建，将会非常曲折，这不仅因为会涉及企业转型，还因为会涉及政府转型和制度变迁。

内生平衡增长，当然也意味着增长质量的提高，这也是我们一直孜孜追求的。但是真的应该问一问，增长质量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否则对增长质量的追求就会像一直以来的情况那样陷入严重的误区并达不到目的。在我看来，挤掉增长数据中可能存在的水分，不属于增长质量的提高，这是统计的准确性问题。GDP 增速从过去的 10% 降到 7% 将自然减少与那 3% 相应的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这最有可能被认为是增长质量提高了。但如果这也算是提高增长质量的话，那退回到增长理论中的马尔萨斯增长时期应该是最有增长质量了。创新也不应被列为增长质量，因为创新实际上属于增长来源问题，当要素投入无法继续增加时，不能创新就不能增长。因此，增长质量包含着比资源环境和创新更加深层的内容。

国内国外历史中曾有过那么一些高增长时期，但高增长带来的不是民众福利的普遍增进而是相反，甚至出现了大饥荒和难以计数的人饿死，出现了对民众的严厉控制和社会的窒息，这无论如何都不能算作有质量的高速增长。如果一时的高增长是建立在官僚意志、强制动员、限制自由、践踏权利的基础上，即使污染得到控制、技术水平大为提高，也不能认为是有质量的增长。增长质量的提高，本质上意味着资源配置的优化，而这背后蕴含着许多深层的内容。强行政策的退出、市场机制的强化、公民自由的伸张、国民权利的保护、大众福利的增进、政府职能的转变，与增长质量的提高基本上是一回事。这是我们在转向内生平衡增长新轨道时所必须牢记的，而且这一切须转化为政策和制度调整。

总而言之，下一步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问题是：能否比较顺利地实现增长轨道转换，从外延失衡增长轨道转向内生平衡增长轨道。根据前面的剖析，实现增长轨道的转换，绝不仅仅是增长战略和发展规划的新表述、新描画，也不仅仅是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新调整、新布置，还不仅仅是调整区域差距、收入差距、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差距的新思路、新手段，而且并不是这些东西的新组合。这些东西是表象、是结果。在笔者看来，中国经济增长轨道的转换，实质上是增长秩序的重构。冯·哈耶克说，把市场秩序理解为一种能够而且也应该按照某种特定的先后顺序满足各种需要的严格意义的经济，乃是极其错误的，这种错误在那些为了实现所谓“社会正义”而靠政府政策去矫正价格和收入的行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中国重构增长秩序、转换增长轨道的进程中，我们能够克服一些极其错误的东西吗？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这个问题并没有一个确定无疑的答案。一方面，中国不但在高增速时期打下了良好的体制基础，也比较快地意识到了走出既有增长轨道、转向新的增长轨道的重要性，因此有条件、有机会避免曾经困扰许多国家的那种冷漠症。另一方面，在外延失衡轨道上的巨大成功可能会强化我们对于前期经验的自傲和前期制度的自满。而许多其他经济体的经历告诉我们：外延失衡增长的一些重要经验、重要政策、重要制度恰恰会构成内生平衡增长的重大障碍。上述两个方面，对于我们而言，一则以喜，一则以忧，乐观和悲观都不缺乏各自理由。乐观的情景是，未来若干年直至十几二十年，政府致力于一揽子的实质性改革行动，使得中国经济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延续高速增长时期的速度惯性，在若干年份实现次高速增长或中高速增长，并及时、平稳地转向内生平衡增长新轨道，使

得速度合适、质量改善的经济增长在较长时期里持续下去，在未来 10 年左右成为世界银行核算体系中的高收入国家并不断向发达国家靠拢，国民福祉不断改善，社会和谐不断增进。悲观的情景是，我们刻舟求剑地制定促进增长的政策、故步自封地拒绝真正的改革，使我国经济潜力得不到充分挖掘，导致增长过分失速，不但经济繁荣成为明日黄花，而且社会裂痕不断扩大，那样就意味着中国现代化进程陷入波折。当然，未来的实际情景最有可能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某种位置，但我们非常期盼，并且理应促成那种乐观情景的出现，这样才能做到避免悲观情景的出现。

三

期盼和促成乐观情景，使中国经济能够在 21 世纪第一个 10 年之后仍保持一定的速度惯性，并能够成功地转向内生平衡增长新轨道，那么在若干年份实现次高速或中高速增长，然后持续更多年份的速度合适、质量改善的中速增长，并不是一定要像江湖术士算八字那样算出一个准确的增长速度，但学者们还是可以通过深入研究给出大致的经济增速范围。从改革开放之后 30 年的增长轨迹来看，可以把 12% 左右及以上的经济增速算作超高速，依次以 2 个百分点为台阶，把 10% 上下算作高速，8% 上下算作次高速或中高速，6% 上下算作中速。尽管可以描述经济增速范围，但实际上，经济学者通过各种模型计算出来的增速数字在很多时候并不靠谱，因为再高深的模型、再高速的电脑都不可能仿真实际经济体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但由于整个社会还有着一种增速数字崇拜，所以即便有那么多失误的预测

数字也不能阻挡更多的预测数据的发布。

笔者认为，我们将进入一个预测数据出错频率更高、出错幅度更大的时期。因为在笔者看来，无论是全球经济增长还是中国经济增长，21 世纪第一个 10 年尚可视作确定性年代，而第二个 10 年则可视作不确定性年代。在那个确定性年代里，短期模型似乎还比较好使，企业以及政府需要做的事情也比较简单：投资，投资，再投资；扩产，扩产，再扩产。只要投资扩产，就有收入利润。但是，在 2008 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虽然各国的经济刺激计划显示了短期效果，但之后不久，经济增长的轨迹就没有那么清楚了，唯一比较确定的是，不确定性年代到来了。在这个不确定性年代，经济低迷是在减轻还是加重，经济增速是会更低还是转高，人们不那么确定了。需求在哪里，资本投入和资本报酬如何相互促进，人们心里更加没底。因此，企业以及政府都表现出几多迷惘和几多踌躇，学者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不确定性的年代，学者最需要做的，其实并不是把经济增速预测做得多么精确，而是要探寻未来增长的可能边界和潜在空间，要认清下一步经济增长的真实动力和发生机制，要理顺释放增长能量和转变增长轨道的制度和政策。

从找回“失去的环节”这个角度来看待经济增长，企业活力的释放、企业创造力的激发、企业竞争力的提升、企业新陈代谢和优胜劣汰机制的形成，无疑至关紧要。千头万绪的道理归结为一句话：宏观经济增长的基础是微观经济主体。而这句话恰恰被宏观经济增长理论所抛弃了，可能是因为把这个简单道理纳入模型就会变得非常复杂，不如劳动、资本等可以标准化的变量那么容易进行数学处理。当然，这里所谓的企业不光限于公

司、法人，也包括无数的从事企业活动和创新行为的个人，譬如个体工商户等等。

不过，在确定性年代和不确定性年代，对企业活力、企业竞争力等因素的侧重点要求并不一样。而且，在确定性年代和不确定性年代，这些因素的形成机理也不一样。例如，在确定性年代，企业竞争力的侧重点可能是成本控制和价格战，而在不确定性年代，企业竞争力的侧重点可能是发掘未知需求和发明新颖产品；在确定性年代，企业生产率的提升可能主要取决于转入高速发展的行业、购入新设备以及对职工的操作培训，而在不确定性年代，这可能主要取决于对现有行业的深耕、对流程的改进、对生产技术和产品性能实行独特化。在那个确定性年代，我国企业部门的赢利能力年年提高，但企业的利润有相当一部分是来源于资源租金和垄断租金，这种赢利模式对企业的腐蚀也非常严重。诚然，国家对资源的过度占有、政府对经济的过度管制，导致了这种赢利模式的流行，但企业自己也难辞其咎。当中国经济不得不转向内生平衡增长新轨道的时候，企业部门的利润来源就不得不从资源租金、垄断租金和简单的规模报酬递增转向创新租金和差异化租金，过去轨道上的资产负债表危机就一定会降临，企业部门必须要重思和重整资产负债表，才能成为新增长轨道上的行星，而经济增长才能获得一定的速度。

总的来看，相对于内生平衡增长时代而言，整个外延追赶增长时代，都可以视为确定性时代。当然前者可以相应视为不确定性时代，因为外延追赶增长可以比较容易对先行国家进行模仿、借鉴、学习、引进、纵向分工与贸易，这些都会极大地减少不确定性。要转入新增长轨道，就需要在

新的环境中，以新的方式方法，拓展新的渠道来进一步释放企业活力、激发企业创造力、提升企业竞争力、强化企业新陈代谢和优胜劣汰机能，这实际上就是要推进一揽子结构性改革来重振全要素生产率。我们这样来认识中国下一步经济增长，不仅遵循了一种常识，还可以让我们比较“像样”地使用宏观经济模型，从而使宏观框架与微观分析更好地连接而不是脱节。事实上，过去十几年里已经有不少经济学家在这样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当然并不是什么独特新颖的观点，但是真正意识到重振全要素生产率对下一步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意识到重振全要素生产率需要发掘新的内生生产率来源，并真正下硬功夫去实现这一点，却比很多人想象的困难得多。下硬功夫去实现这一点，关键是要及时推进一揽子结构性改革。

一揽子结构性改革计划，主要应该包括要素配置领域的改革、企业领域的改革、财政和政府领域的改革。推进这三个领域的改革，在提升效率、缓解失衡方面的效果最为显著。

在要素配置方面，无论是金融、土地领域，还是劳动力领域，尽管过去 30 多年已经引入了市场机制并且市场机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仍然存在许多严重的扭曲。如果能够消除这些扭曲，就能够产生新的提高配置效率的空间，对于保持中国经济的适度、持续增长具有重要意义。金融改革应该着力放松管制、消除抑制，金融机构应进一步提高商业化程度和产权改革的力度，并加快发展以民营资本为主导的各类中小金融机构；应推进金融体系全面市场化的进程，包括利率、汇率、资本账户、行业准入等方面都需要进一步加快市场化。同时，金融监管体系也需要进一步的改革，使监管的独立性和专业性得到强化。土地领域虽然非常复杂，争论